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谭正 张洋 朱恒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关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现在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市场经济呼唤民主政治，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如马克思所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经济上的平等与自由自然会唤醒人们对政治平等与自由的渴望——最明显的表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是，是否如某些人所言：民主政治必定能带来经济繁荣或市场经济只能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出现和发展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

如美国学者施密特和卡尔所言：首先，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比其他的政府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更有效率。民主国家下的增长、储蓄、及投资的积聚率也不一定比非民主制度更快。在转型阶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那时，处于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特权集团和管理精英们由于资本抽逃、撤回投资、阴谋颠覆等活动对他们所享受到的“权利”真正（或以为）构成了威胁，将会迫使他们做出反应。恰恰此时，期盼在这种类型的民主制度下由于财富分配、需求聚合、教育、生产力和创造力等最终共同带来经济和社会业绩的提高。然而要使这些情况很快就发生改观，期望值显然太高了，它们绝非民主化的必然特性。

其次，民主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未必更有效率，它们的决策甚至可能比它们所取代的旧体制更缓慢，如果仅仅是因为碧血跟更多的行动者商议的话。开展工作的成本可能更高，如果仅仅是因为要给人更多的秘书们付“报仇”的话（尽管谁也不会低估专制体制的腐败程度）。民众对新民主政治的成绩也许不会更满意，如果仅仅是因为必要的妥协让步不能从根本上取悦任何人，以及失败者有发泄不满的自由的话。

再次，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最初并不实行民主政治。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和香港。英国在长期内是贵族制政体，英国确是（作为制度的）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而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被英国当局殖民统治的，香港的经济具有极高的自由度，因此以“自由港”闻名于世。自由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法治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两者是共生的，作为硬币的两面的存在。一些非民主东南亚国家（不包括日本）在经济发展（注意不是市场经济）上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较快的进步，虽然这进步并不能持久，偶尔要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有学者如扎卡利亚将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归结为没有“自由”，仅是“自由化”的专制，当然世界上其他专制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纪录都是可怜的。

最后，民主国家将有比它所取代的专制政体更开放的社会和政体（无论怎样强调这是个伟大的进步都不过份），但未必有更开放的经济。今天许多根基稳固的、极其成功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曾求助于保护主义和锁国政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它们的表现；并十分指望用政府的干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但长远来看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不容置疑。而某些威权主义国家确实经济具有了某些开放型，也确实引发了本国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智利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案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倡导把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为开放的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当然其中有“芝加哥男孩”的影响）。财产权受完全的保障，贸易实行单方面的自由化，且大部分地区都欢迎外国投资。具有弹性的劳工立法被制定出来，而由私营部门所管理的退休基金方案，则取代了传统由国家经营的“只要离开就付钱”的体制。事实上，智利是威权体制国家中，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唯一例子。在1976年和1980年之间，达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及降低了通货膨胀，然而，经济部门的技术型的政策失误（例如外汇汇率与美元挂钩和对外债的过度依赖），加上石油和外债危机，造成了1981~1982年间毁灭性的财政崩溃。政策失误及其造成严重后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威权体制缺少民主政体的商谈机制、责任机制、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威权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注定只能一时风光。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管理效率、自由市场。无疑这些特性对民主化转型国家来说使巩固民主政治的任务更容易些，但它们既非其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也非其直接的产物。相反，我们应该期待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能够保证以和平竞争的方式组织政府、影响公共政策；它能够通过固定的程序调整社会和经济冲突；它与市民社会有充分的联结，从而可以代表各自选区的选民，并为集体行动的事业作出承诺。从另一角度考虑，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民主政治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消极自由是目的，而积极自由是实现或保护这个目的的手段；市场经济的最大敌人是来自政府的干涉，民主政治虽然并不必然带来市场经济，但它能使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获得广泛认同并制定出稳健的转型政策，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产生后，民主政治是防止政府握有干预经济事务的无限权力的有效手段，这种政府权力将使市场经济受到限制并最终消灭市场经济。